



中华文学

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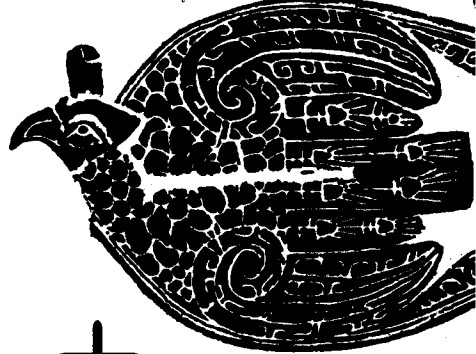
第六卷·近现代文学编

华艺出版社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华

文学

093676

通史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现代文学编
现代文学(上)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樊 骏
编 委 王 飏 扎拉嘎（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 邓敏文（侗族）
 石昌渝 刘世德 刘扬忠 刘魁立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张大明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郎 樱
 降边嘉措（藏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以姓氏笔画为序）
秘书长 董乃斌 郎 樱
副秘书长 陶国斌 严 平

近现代文学编编辑委员会

主编 樊 骏

编委 万平近 王 飏 扎拉嘎 (蒙古族)

邓敏文 (侗族) 关纪新 (满族)

关爱和 刘扬体 吴子敏 吴福辉

连燕堂 张大明 袁 进 黄淳浩

梁淑安 温儒敏

目 录

现代文学（上）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	(3)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3)
第二节	现代文学思潮的传播与文学社团的涌现	(15)
第三节	初期文学理论建设	(24)
第二章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31)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发展	(31)
第二节	《呐喊》、《彷徨》	(41)
第三节	《阿Q正传》	(50)
第四节	杂文	(56)
第五节	散文和《故事新编》	(68)
第六节	文学思想	(77)
第三章	郭沫若	(86)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活动	(86)
第二节	《女神》	(92)
第三节	《瓶》与《恢复》等诗集	(102)
第四节	《屈原》及其他剧作	(109)
第五节	小说及其他	(117)

第四章	“为人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	(127)
第一节	胡适、刘半农与“五四”初期的创作	(127)
第二节	冰心、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等作家	(142)
第三节	叶绍钧	(162)
第四节	周作人	(172)
第五节	语丝、莽原、未名、沉钟等社团的创作	(181)
第六节	初期话剧运动	(196)
第五章	创造社及新月派	(205)
第一节	郁达夫	(205)
第二节	创造社诸作家	(215)
第三节	徐志摩	(225)
第四节	闻一多及其他诗人	(235)
第五节	成仿吾、梁实秋的文学批评	(246)
第六章	张恨水与其他通俗小说作家	(258)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和衰落	(258)
第二节	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作品	(270)
第三节	张恨水	(284)
第四节	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的武侠小说	(307)
第五节	程小青等人的侦探小说	(323)
第七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左翼作家联盟	(338)
第一节	革命文学论争	(338)
第二节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348)
第三节	瞿秋白、冯雪峰の文学理论批评	(359)
第八章	茅盾	(370)
第一节	生平及早期创作	(370)
第二节	《子夜》	(381)
第三节	《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	(387)
第四节	《腐蚀》及其他	(394)

第五节	文学批评·····	(405)
第九章	左翼作家的创作(上)·····	(413)
第一节	蒋光赤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创作·····	(413)
第二节	“左联五烈士”·····	(424)
第三节	丁玲和张天翼·····	(435)
第四节	艾芜等作家的小说·····	(447)
第五节	萧红、萧军等东北流亡作家·····	(458)
第十章	左翼作家的创作(下)·····	(466)
第一节	田汉·····	(466)
第二节	左翼电影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476)
第三节	中国诗歌会诸诗人·····	(494)
第四节	杂文与报告文学·····	(503)
第五节	叶紫、吴组细及“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	(511)
第十一章	“五四”文学道路的拓展·····	(521)
第一节	鲁彦、李劫人等人的小说·····	(521)
第二节	欧阳予倩、洪深等人的剧作·····	(534)
第三节	臧克家·····	(544)
第四节	林语堂与其他散文作家·····	(552)
第十二章	满族作家老舍·····	(566)
第一节	初期长篇与短篇小说·····	(566)
第二节	《骆驼祥子》·····	(576)
第三节	通俗文艺、话剧创作与《四世同堂》·····	(582)
第十三章	巴金·····	(591)
第一节	前期创作·····	(591)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603)
第三节	从《火》到《寒夜》·····	(610)
第十四章	曹禺·····	(620)
第一节	走向剧作家的道路·····	(620)

目录

第二节	《雷雨》、《日出》和《原野》	(624)
第三节	《北京人》及其它剧作	(634)
本卷后记		(644)

现代文学 (上)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经过近代文学摆脱传统、探索新路的实践,“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在整个中华文学发展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的始起。现代文学通常指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发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多年间的文学,广义上又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现代”是时间概念,表明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的文学;同时又是文学性质的概念:现代文学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情感与时代精神,在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多个方面,具备与传统的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特色。

中国文学朝现代形态变革的趋向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触发了一系列的文学变革,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形成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但就文学的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变革既不全面更不彻底,带有浓厚的改良的色彩。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无论“破”还是“立”都是不彻底的,毕竟从政治上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民族工业得以发展,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都有较快的增长，更从根本上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另外，随着清末以来废科举，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以及大量学生出国留学，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形成了开放的机制。据统计，一九一七年全国已有新式大、中、小学十几万所，学生约四百万人。尽管这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却以其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民主意识和开放意识，成为寻求新变革的积极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①正是他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还有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有袁世凯复辟以及军阀专权的极其黑暗的一段时期。而统治者之间你争我夺，政权频繁更迭，使他们无暇顾及精神领域与文化事业，因此相对而言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也比较自由的时期。转型阶段特有的思想自由的氛围有利于广为接纳各种现代思潮，有利于对传统的反省，知识分子的视野空前拓宽了，新文化运动包括文学革命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从晚清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历次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使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领域开展一场彻底的反对旧思想的启蒙运动，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的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的是，新一代知识精英的关注点转向了对精神文化的现代化追求，他们相信社会变革进化的前提是国民精神的解放，以为欧美之强，在于民主政治，其根柢又在于人的解放，那么中国的救亡与振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也要“立人”——通过对中国的启蒙，造成一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546页。

种全新的社会性格,进而实现民主政治,当务之急则是在传统文化根子上动手术,解除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束缚。先驱者们怀着这种精神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肇始。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辞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和“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一开始就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来考虑中国的改革。此后,他们就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思想启蒙的主要武器,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 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 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五四运动阶段,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批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一九一六年《新青年》连载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一文,指出自西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子思想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思想专制”之弊,使“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① 陈独秀指出,服务于“纲常阶级制”的孔子封建思想,是与近代“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绝不相容的,^②“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是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礼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③ 李大钊则认为独尊孔孟导致思想僵化,断绝了中国向近代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不过,他认为“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

① 易白沙:《孔子平议》,载《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和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

③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

治之灵魂也。”^① 新文化运动以反孔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直接的效果便是打破文化专制主义，普遍要求思想自由，反对以“社会言论武断之力”，轻率地“对于异说加以距辟”。^② 思想解放，不同学术观点平等共存，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准备了活跃健全的舆论氛围。

反孔又深入到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层面，促成了个性解放的浪潮。陈独秀等猛烈攻击“三纲五常”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对人性的扼杀，揭露其维护“阶级尊卑制度”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封建纲常压制下的臣、子、妻、卑、幼完全成了君、父、夫、尊、长的附属品，失去独立自由的人格。因此，从封建纲常派生的旧道德，如忠、孝、节，等等，无不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③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则深刻揭露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吴虞更是指出封建礼教实际上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而“孝悌”二字便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④ 他愤怒地喊出“打倒孔家店”，一时成为青年人反传统的激进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橥批孔的大旗，对传统采取猛烈攻打的态度，矫枉过正，有片面性，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份。极端的例子，是当时一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如钱玄同、陈独秀甚至主张废除汉字，以彻底堵塞“腐毒思想之洞窟”。但先驱者们采取彻底批判传统的态度，重新审视一切旧文化，敢于冲破旧垒，蔑视权威，开拓新路的精神，代表价值观点的转变。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分子纷纷以重新估价一切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

① 宁常（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② 宁常（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民彝》创刊号（1916年）。

③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

④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载《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

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教育、文学、艺术、妇女,乃至贞操等等问题,实际上又是一场场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和讨论的风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了,同时又使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迅速打破了大一统的文化专制的格局,“思想自由”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还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也无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义,都是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坚信“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以求真理之发现,学术之扩张”。^①这种彻底开放的世界性眼光也是超迈往古的。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纸刊物和书籍争相译介西方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而且多是歧化选择,即同时译介多种不同倾向的思潮。如《晨报》副刊就先后译介过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及日本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等等。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社会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都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旧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实施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作整体性歧化选择,企图以此取替和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全面开放,最大限度地介绍引进各种新进文化,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更宽阔的余地,这又是不可或缺的。

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

^① 陈独秀:《随感录》,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

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一九一八年一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开明治校、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各种新旧思潮在北大自由竞争，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终于导致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照陈独秀等人看来，国民精神的彻底革新，必须铲除“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① 他们把“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当作思想启蒙的两翼，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总清算，又必然同时去除那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及文言文。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也随之发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几乎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也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部署，成为其中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的功利色彩。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命，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大致触及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文学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特别是文学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

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趋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原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的,语言是文学之所以有别于其它艺术形态的根本所在,离开了语言,也就没有文学。“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 根据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规律,把变革语言作为变革文学的突破口,无疑是个正确的选择。以白话取代文言,立即改变了文学的本体,并为进一步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和必要的出发点。事实上,文白之争在当时已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一个焦点,胡适此文发表适逢其时,虽然写得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发难之作,有突出的功绩。汉族文学长期采用文言写作,形成作品的文字与实际生活中的口语脱节的现象,从而影响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史上持续了几千年的这种局面。

紧接着在同年二月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明确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对整个封建旧文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不但反对旧文学“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形式,也反对其“萎琐陈腐”的封建思想内容。他从启蒙的角度

① 胡适:《〈尝试集〉自序》(原题《我为什么做白话诗》),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